

● 杨政 著

SHANDONGQINGNIANZUOJIAYUQILUWENHUA

与山东青年作家 与齐鲁文化



序

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政同志，精心撰写了《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这部书稿。大概杨政同志以我为其学长、平时彼此对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又交谈较多之故，要我为之写序。盛情难却，便欣然应诺。我深知为一部书稿作序，比写一篇简括的图书评论文章要难。虽如此，既然答应了，就得言而有信。所以，在这部书稿付梓面世之际，谈点一孔之见。

杨政同志多年来专心致志地研究山东当代文学。最初，她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五六十年代山东作家与作品方面。与此同时，她也关注新时期山东一些青年作家的创作，并为他们的崛起和创作成就所感染，逐渐有计划地阅读他们的作品，搜集有关他们的创作资料，探讨他们的创作趋向。日积月累，兴趣加浓。于是她把研究新时期异军突起的山东青年作家，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她在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区域性文学研究中，废寝忘食，刻苦自励，绝少交往，笔耕不辍，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她不仅在已出版的《山东当代作家论》一书中任副主编，并承担了其中的《第三代山东作家综论》以及几个青年作家“作家论”的撰稿任务，而且先后写了《崇高的心灵美的深入开掘》、《应该塑造更美更崇高的灵魂》等多篇论文。其中《张炜的美学追求》获山东社会科学

院“六五”期间优秀成果三等奖，《简论新时期的山东小说创作》获山东省（1987—1988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可以说，她这些研究山东当代作家与作品的论文，及其在写这些论文过程中所下的力气、耗费的心血，为其撰写《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这部书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杨政同志在已取得的对山东青年作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认真探索，刻苦钻研，努力向新的研究高度攀登，选择了新的研究课题，并且取得了实效，撰写出了《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这部专著。就目前我省对青年作家与作品的研究现状来说，我觉得这部书稿，颇有新的突破。在山东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她这种探索、创新、开拓、进取精神，很值得称赞。

《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主旨明确，纲目清楚。每部分所论述的内容各有侧重，重点突出。例如：

绪论，着重论述了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作家作品的必要性，以及撰写本书的目的和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

第一章，侧重介绍山东的历史、人文背景；山东古今经济、政治状况；山东学术思想发展概貌；山东历代文人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齐鲁民风及抗争精神；五四以来，山东的几代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二章，主要阐述齐鲁文化对山东青年作家的性格、情操及创作态度的影响。

第三章，从执著地热爱家乡，深情地赞美家乡等方面，论述山东青年作家的家乡观念、乡土感情，及其创作表现，并剖析了山东青年作家留恋乡土、热爱自然的情感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同时，也指出了他们乡土观念和情感的局限性。

第四章，重点论析山东青年作家早、中期创作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积极的参与意识；从粉碎“四人帮”后的控诉

“文革”、指责不良的社会风气及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到反映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精神风貌。

第五章，着重评述山东青年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赞颂与批判，并通过分析创作变化，阐明他们思想意识的提高和演变。

第六章，综述山东青年作家立足乡土，反映自己所熟悉的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描绘不同人物的性格。在这一章中，尤其可贵的是分析了山东青年作家在其作品中，既能展现乡亲的优秀品格、高尚情操，又能对其思想品格，以及文化风习中不健康、消极的一面，进行恰切地批判。

第七章，从创作实际出发，分析山东青年作家的美学思想、艺术追求，以及发展演变的状况。

结束语，指出山东青年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明显的不足，强调山东青年作家不能太拘囿于传统文化的束缚，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创作成就，而应该以原有的创作成就为新的起点，立足于齐鲁大地，进一步继承、发扬齐鲁文化的优良传统，创作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优秀文学作品，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

鲁迅先生曾指出：“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见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鲁迅论文学艺术》，第229页）我深受鲁迅这段话的启示，所以除对作者情况略加介绍外，又特对《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中各个部分所论述的重点，分别加以概略归纳，其用意在于方便读者阅读。

读完这部书稿，掩卷思之，自己也有点滴不成熟的想法。我感到如能将各部分的内容与齐鲁文化的联系，阐述得更充实些；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再紧密些，全书的整体感再强些；涉及

的山东青年作家面再广些，可能这部书稿会更加增辉添彩。此拙见，一来供作者参考，二来就教于广大读者。

祝贺杨政同志新的研究成果《山东青年作家与齐鲁文化》问世！

赵耀堂

1991年3月于泉城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齐鲁大地——山东青年作家的“根”	(6)
第二章 齐鲁文化传统对山东青年作家人格的影响	(37)
第三章 浓厚的家乡观念执著的乡土恋情	(57)
第四章 与祖国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87)
第五章 从讴歌传统到批判反思	(120)
第六章 映现齐鲁大地的风土民情和人民性格	(156)
第七章 现代观念影响下的审美意识演变	(188)
结束语 坚持自己,超越自己	(223)
后 记	(229)

绪 论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中国文学，被文学史家们称为“新时期文学”。在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崛起了一个十分壮观的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一般被认为由“归来的作家”（即1957年被打成右派，近20年消声匿迹，粉碎“四人帮”后得以平反复出的那些人）和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青年作家组成。这些作家的“崛起”给新时期文坛带来了崭新的面貌。在新时期山东文坛，也出现了一个阵容整齐的作家队伍左右着山东文坛。这个队伍里没有“归来的作家”，而主要是由一批年轻人组成。虽然这个队伍中的一些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或正在步入中年，但是在他们登上新时期文坛之初，却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更何况一批批更年轻的文坛新秀不断地涌现。因此，我们将这些在新时期崛起，年龄最大不超过四十七八岁的山东作家统称作“山东青年作家”。

虽然这个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其各自的创作个性，但是他们也同时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在新时期中国文坛上，他们是具有自己独特性的文学劲旅。他们的这种属于“山东作家”的独特性，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注意。探究这些山东作家们的独特性，探究形成其独特性的原因，是一个山东的文学研究者应尽的义务。

法国哲学、美学家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曾经提出了文化（文学）的种族、民族、地域性这样的命题，并进行了启人心智的精辟论述。丹纳的这一命题，不但对“世界文

化”这个大范畴来说是适用的，就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区域性”的烙印也是明显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给文学带来了蓬勃生机，各种文学流派、不同的艺术探索纷至沓来，这是作家们最能发挥个人特长、充分发展个性的时代。在这个条件下，文学的区域性文化特点也明显地显示出来了。当然，把中国新时期文学放在世界性的文学格局中，它自然带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印记；但是，如果放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上，放在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影响中去分析，“区域性”特点就是不可忽视的了。

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的文化传统。传说中的“图腾文化”先不必说，就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按照时间段落划分，就有夏文化、殷商文化、周文化、秦汉文化、两晋文化、唐代文化……等等；按照空间地域概念划分，又可分为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关中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等。就区域文化来说，虽然有许多属于民族共性的东西（如统一的文字），但在方言、风俗、习惯、经济状况乃至道德观念上，不同地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些东西虽然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沿革、演变、互相影响和融合的过程，但其中某些个性的东西仍然在各不同地域文化中保留下来了。有些虽然表面形式已不存在，但仍然保留在当地民众的思想意识里，如荆楚之地人民群众的笃信巫鬼、极富浪漫幻想，等等，就不同于北方人民的质朴、崇实；陕西、青海、东北及边疆地区人民的粗犷、野性，也与受齐鲁文化熏陶较深较重的山东人的性格、气质和道德观念有所区别。

文化的地区差别必然影响到生长在那块土地上的作家，因而也影响到文学，正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虽然得到

了世界的认可，却仍然代表着拉美地区的作家和文学一样，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关中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带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文化传统，使他们那个区域的作家打上了地域文化传统和风土民情的烙印。翻开中国新时期文学浩繁的卷帙，五光十色的地域文化色彩会令人眼花缭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研究界已经注意了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看到了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的影响。也有人注意到齐鲁文化传统对山东作家的影响，认为山东作家因为它的文化烙印而成为一个有个性、有特点、值得注意的创作群体。

但是，也有人不太同意“齐鲁文化”的提法，认为齐鲁文化在本质上是儒家文化，自汉代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已经成为统治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文化，所谓齐鲁文化，已经不再仅仅属于齐鲁之邦所有。因此，在山东作家作品中去寻找“齐鲁文化烙印”是没有意义的。

笔者不同意这种否定“齐鲁文化”存在和影响的观点。其理由有三：一、齐鲁文化虽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但儒家文化却不能概括齐鲁文化的全部，更何况春秋战国时代的齐文化和鲁文化本来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对后世一直存在着各自的影响。关于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深入地考证和探讨。山东社会科学院逢振镐先生的《东夷古国史论》尤其集中而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其中的《齐鲁两国建国方针之比较研究》一文，从齐鲁两国最初的建国方针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等几个方面，对齐文化和鲁文化进行了系统比较，得出了齐文化有别于鲁文化的结论。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选择了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齐文化的核心部分也逐渐被儒家文化所融合，但是，灿烂的古代齐文化留下

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因而，今天所说的“齐鲁文化”仍应该包括“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部分，只不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罢了。其二，“齐鲁文化”作为一个相对于“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关中文化”的文化系统，齐鲁大地作为位于北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的—个地理区域，远古时代也有自己的氏族起源和文化渊源，夏、商、周时代的“东夷”部族中的土著，有着与中原各氏族不同的祖先（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在第一章里作出论述），有着自己独立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当今齐鲁之地的风土民情和人民性格，仍有其区别于其他地域的东西。因此，即使“齐鲁文化”被定为中华民族的大—统文化，也无法抹煞齐鲁之地与其他文化地区的某些差别。其三，虽然儒家大—统文化思想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但因为齐鲁之邦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受到儒家文化影响最深最重最直接的当然首先是齐鲁之地的人民群众。“齐鲁为文化礼仪之邦”，这是孔孟老夫子教化影响的结果。《中华全国风俗志》^①特别提出“邹鲁遗风”以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民风民俗，并且将其作为可资效法的榜样来称颂。在称颂其他文化区域的民风较“知礼义，重廉耻”时，也往往以“风近邹鲁”、“有邹鲁遗风”之类的词句誉之。可见，“齐鲁文化”对其发源地上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在文学研究的视角大大开放，不再局限在单一的研究领域的今天，从地域文化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文化学角度来研究山东作家，寻找他们形成自己独特性的文化根源，对于认识中国文学在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

^① 胡朴安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取“史论结合，以论带史”的方法，既从横的方面剖析现象（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风范、作家的文化心理、审美意识和艺术观念等等），又从纵的方面展示其发展动向；即显示、考察作家写了什么，又探讨他们为什么这样写，试图通过这种努力，展示新时期山东作家及其创作的整体风貌和文学成就。

第一章 齐鲁大地——山东青年作家的“根”

按照丹纳的提示，我们研究山东青年作家，必须首先从作家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齐鲁大地谈起。这块具有悠久的人类文明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丰富的自然资源的山川沃土，是山东青年作家赖以孕育、萌发、茁壮成长的肥田沃土。

让我们越过历史的篱笆，再一次地俯视、亲吻这块美丽富饶而历史悠久的土地吧。

(一)

齐鲁大地在殷商以前被叫做“东夷”之地，从周武王灭殷分封了姜太公和周公旦，分别建立了齐、鲁两国之后，才一直延续下“齐鲁”这个别称。

这块古老的大地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的中北段，濒临渤海、黄海。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成山角，被古人称为“天尽头”。孕育过中华民族灿烂的远古文明的黄河从这里穿过，号称“五岳之尊”的泰山雄踞在齐鲁大地的中央，贯穿祖国南北的大运河从这里跨过；这里有广阔丰饶的平原，绵延起伏的丘陵，风光秀丽的大山，浮光耀金的河流湖泊；这里光热充足，气候温润，降水量比同纬度的内陆地区要高得多；这里地形多变，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湿润平坦肥沃的平原有利于发展农业，绵延的

山区有益于林果业的发展，广阔的海域、众多的河流湖泊便于渔业、海上运输业和水利资源的开发，丰富的矿产资源又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

这块土地具有悠久的人类文明历史。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原始人类活动的踪迹，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最早的山东人应该是活动在山东东部山区的“沂源人”。“最早的山东人的发现证明，山东的历史可以上推到四五十万年以前，山东人民无愧是祖国大家庭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①根据古史传说和考古学家的考证，在山东半岛生活着的是许多个起源于与中原各部族不同祖先的氏族，如莱夷、徐夷、邾族、鱼族、蒲姑族等，在殷商时代被统称为“东夷”。据说，莱夷、徐夷各部族是山东半岛的土著。它们既与中原各氏族有一定的联系，又有自己的风俗、文化传统。这些东方民族“不仅是组成汉民族在‘人种学’来说是居于主要的成分，同时在我国古老文化的传统方面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②古老的东夷人在这块为涛涛黄河滋润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辛勤劳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人类远古的文明。

在距今约七千年至六千年之间，这里产生过属于新石器早期偏晚至中期阶段的北辛文化（以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命名），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多年以前，这里又诞生了标志着新石器中期文明的大汶口文化（以泰安大汶口遗址命名），“经历了大约两千年的发展，生动地展示了由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全过程。”^③这里还产生过以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命

① 项观奇：《悠久的古代历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

② 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1981年。

③ 徐北文等：《灿烂的古代文化》，齐鲁书社1984年。

名的闻名中外的“黑陶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根据出土文物和墓葬发掘的资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的物质面貌足以反映比“大汶口文化”更高的社会生产水平。在这一原始文化阶段中，山东人走完了原始社会的最后一段历程，迎来了阶级社会的曙光。

如果说关于“舜耕历山”的传说是否在山东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以凤鸟为图腾的邾族的高祖少昊的陵墓却至今仍屹立在山东的土地上。这里也曾经是与少昊有血缘关系、同样以凤鸟为图腾的殷商王朝的“后院”，从殷商开国君主成汤迁居亳地（据考证为今山东曹县）以来，先后有近十代君主都居于亳地。后代君主们历经了多次迁徙，在经过100多年之后，又迁回了如今的山东曲阜（奄），直到约40年后盘庚迁都殷地，奄地是几代殷王的都城。可见山东曾经为殷商文化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到了周王朝统治时期，齐、鲁两大诸侯国在山东建立，愈来愈显示了山东地区地位的重要。山东是灿烂的齐鲁文化的发源地，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文化中心，不仅领导过春秋战国时代经济、文化的“新潮流”，而且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均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周王朝统治时期，齐鲁大地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鲁国是周天子最信任的弟弟周公旦的封国。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十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再加上鲁国宗室和贵族的势力比较强大，极有利于私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鲁国新兴地主阶级“三桓”统治时期，私家经济更加壮大，私田更加扩展，促使了鲁国首先推行政治经济改革，颁布了“初税亩”法令，使私田合法化，这就更加促进了鲁国经济的发展，使春秋时代的鲁国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先进国家。鲁国出产的“鲁缟”，是当时最精美的纺织品之一。

齐国是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这里的自然条件远不如鲁地优越，“地泻卤，人民寡”，不象鲁地那样宜于农桑。姜太公治理齐国，不象周公旦的长子伯禽那样重视推行周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礼俗制度，而是极重视发展经济。姜太公根据齐地的自然条件，“劝其女工，极技巧，通鱼盐”^①，“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②，很快改变了那里的贫穷落后面貌，并且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富足，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强国。到齐桓公时，由于任用商人出身的管仲为相，齐国的纺织、刺绣、织带、编屨等手工业和渔业、盐业、采矿冶炼业发展更为迅速，技术水平已相当先进，尤其是纺织业更为发达，故《汉书·地理志》上有“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之说。管仲又极其重视发展商业，鼓励四方商贾到齐国经商贩运，并在大城镇设置大量旅邸以招徕商贾，故“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③

春秋时代的齐国是五霸之首，战国时代的田氏齐国更加强盛，不但被列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又与秦、楚鼎为三大强国，其实力又在楚之上。对于战国时代齐国的强大和齐都临淄的繁华，当时的纵横家苏秦有一段相当精采的描绘：

“齐南有太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

①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

② 《史记·齐太公世家》，同①。

③ 《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 1959 年。

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踰鞠者。临淄之途，车击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战国策·齐策》

这种经济发达特别是商业繁荣的盛况，一直延续到汉代，仍有“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①的美谈。

先秦两汉时代的齐鲁大地，曾以它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达，立足于中华民族的领先地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唐代以前，山东的经济文化一直都处于领先的状态。即使是唐宋之后，北方的经济由于多次战乱而遭到严重的破坏，发展渐趋缓慢，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但是，“在同样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具有悠久传统的山东小农经济仍然具有稳步发展的内在潜力，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山东的农业经济仍然可以同南方地区并驾齐驱。”^②另外，在开发江南的过程中，齐鲁人民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早在三国时代，山东就有迁居江南的士族。高平王粲、琅琊诸葛家族，是较早南迁的山东人。到了西晋末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利争夺，引起了五胡十六国在北方的连年混乱，迫使北方门阀士族大举南迁。在迁居江南的北方门阀大族中，有很多是山东人。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郗氏、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和颜氏、泰安南城羊氏、兰陵萧氏、东莞刘氏等，是山东南迁士族中最著名者。郗、王两家，后来成为东晋时期最显赫的大封建庄园主。这些南迁的大地主，不但本人及其亲属南迁，而且往往带着整个家族，宗

^① 《史记·曹相国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

^② 邢洪海等：《山东的自我意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亲、乡里、宾客和佃户成千上万的人渡江南下。他们在江南重建家园，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把齐鲁之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与南方的门阀世族一起开发了江南的肥田沃土。因此，在江南经济、文化发展史上，应该记下齐鲁人民的一份功劳。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地大举南侵，使北方广大的土地陷于战乱之中，山东和整个北方的经济相对衰落了。当年的齐国那种农、工、商并举的开放的经济格局早就被“重本抑末”的保守观念所压制，使山东成为一个以农为主的省区。而连年的战争破坏和涝、旱、虫灾，使田园荒芜，土地趋于贫瘠。这一切造成了山东地区保持着小农经济的落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肌体上缓慢地进行着。虽然山东经济落伍了，然而，它毕竟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有丰富的资源，有广阔的海域和较长的海岸线，有黄金时代留下的“旧家底”，山东仍不能算作全国最落后的地区。而且，在山东内部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沿海一带以及受过齐文化陶染的地区与山东腹地及儒家文化熏染最重的地区有所不同。前者有较开放的思想意识，虽然奔竞经商和从事副业、手工业生产被视为“末路”，他们仍有从事“奔竞”的习惯。特别是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也催化了山东沿海一带资本主义的萌芽。另外，山东沿海一带居民虽然比我国东南沿海居民有较重的“安土重迁”意识，但是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飘洋过海，外出谋生，在山东与海外的经济往来中架设了桥梁。在当今经济腾飞、改革开放的时代，山东沿海地区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了，成为全国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域之一。在北方农业省区中，山东仍然可以算作走在前列的省份之一。这应当是一代山东作家得以产生的经济根基。